

“十五五”时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 高瑜 李静雷

技术突破和制度创新,提升我国在深海、远海、极地等领域的自主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海洋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是否自主可控,海洋经济的未来,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水平。“十五五”时期,应聚焦深海探测、海工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增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能力。此外,加强海洋数据资源整合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海洋观测、预警和管理能力,让科技成为推动海洋产业跃升的第一动力。

同时,要健全海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通过加强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构建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海洋科技创新生态。

二、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十五五”时期,海洋强国建设首先要体现在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上。一方面,港口航运、海洋渔业、船舶制造等传统行业仍是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撑,要推动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相关产业的质量和效益,使港口从“规模扩张”转向“枢纽服务能力提升”,渔业向深远海养殖和海洋牧场延伸,船舶工业在绿色燃

料和高端船型方面实现突破等;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深海资源开发利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海洋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

同时,要注重海洋产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依托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载体,推动海洋产业集群化、链条化发展,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经济增长极。

三、优化海洋空间布局,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海洋问题具有高度综合性和系统性。“十五五”时期,必须更加突出系统治理理念,推动从碎片化、部门化管理向协同化、一体化治理转变。其一,要将海洋经济建设目标系统融入国家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强化规划衔接和政策协同,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通过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形成推进海洋经济建设的整体合力。其二,海洋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是中央层面的战略部署,也需要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探索。“十五五”时期,应加强沿海地区统筹协调,推动港口群、产业带和海湾经济区协同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通过港产城融合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打造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经济集聚区。因地制宜推进海洋发

展,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参与、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其三,海洋是人类共同的空间。“十五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建设必须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进。要积极参与国际海洋规则制定和全球海洋治理,加强与沿海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海洋生态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要推动海洋领域对外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相衔接,拓展蓝色经济合作空间,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

海洋强国,首先是生态良好的强国,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十五五”时期,必须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守住海洋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加强对重要海域、重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保护,强化源头治理和陆海统筹。

在此基础上,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与治理,系统推进海湾、海岛、海岸带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推动从“末端治理”向“系统修复”转变,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并不断健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体系,提高海洋生态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同

时,探索蓝碳经济发展路径,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实现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五、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海洋经济涉及多部门、多区域、多产业,必须形成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化,海洋风险和安全隐患日益凸显。“十五五”时期,要统筹推进海洋发展和安全,健全海洋治理体系。一是要不断完善海洋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强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工程建设、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规范管理。健全海洋经济统计监测体系,优化海域使用和岸线管理制度,强化金融支持和人才保障,围绕海洋资源产权、生态补偿、科技创新、产业扶持等重点领域,加快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为海洋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二是要强化海洋灾害预警、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提高对极端气候、海洋污染事故等风险的综合防范能力。通过提升海洋公共服务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海洋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坚实保障。

总体来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从夯基垒台向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海洋经济发展不再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生态安全。只要坚持创新引领、统筹布局、绿色发展 and 制度保障并举,我国海洋经济完全有条件在新阶段实现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建设海洋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史考察

■ 崔博文

七事变爆发后,在日军疯狂进攻下,中国的大片国土沦陷。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历史使命,通过整合全国抗日力量,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斗争的实践,不仅凝聚了救亡图存的伟力,更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

一、历史背景

(一)民族危机的深化

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还控制了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但在中国人民的不懈抗争下,使日军侵华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国民党政权方面,在西北、西南保持着较大数量的军队,继续号召抗战。在华北、华中等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牵制和抵抗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调整侵华的政策。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对华声明,在此声明中重提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声明诱惑国民党,这使得国民党内的降日派更加活跃起来。同年12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呼吁其停止进攻、坚持团结抗战。但国民党方面固执己见,随后又悍然发动了轰动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行径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在1939年1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此会议虽然肯定了抗战的立场,然而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会后,国民党还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办法,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限制与打击。

1941年起,日军集中了大部分侵华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清剿,以及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由于日军的持续扫荡以及华北地区遭受的连年自然灾害,敌后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

(二)抗日力量的整合

在严峻的抗战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整合抗日力量,极大地增强了全民族的抗战合力。

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在政权问题上,党中央提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政权的正确方针。1940年3月,中共中央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出指示,第一次明确指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抗日根据地普遍执行该政策,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十分落后的封建租佃关系。为了激发广大贫苦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1月28日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统一战线性质的土地政策为核心,系统整合农村各阶层抗日力量,成为巩固根据地、凝聚全民抗战合力的关键举措。该决定突破单纯阶级斗争逻辑,以利益平衡为纽带,不仅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肯定富农的重要作用,即抗日与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当时中国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详尽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各项具体政策,实现农村各阶层抗日力量的全面整合,既坚守了发动农民抗战的核心立场,又以灵活政策团结一切可团结的阶层,实现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统一。

经济政策与政治战略的统一,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凝聚全民抗日力量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也为后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整合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实践路径

(一)以共同体意识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

民族危亡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全中华民族共同抗日、捍卫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各民族一体抗战”作为最高纲领,放弃早期激进民族主张,摒弃单纯阶级斗争,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统合所有民族、阶层、区域工作,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放在最高位置。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进行了系统性总结,指出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在同一国内实现平等与自治,共同对敌是最高原则;明确批判大汉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两种破坏共同体的错误思潮,否定“民族分立”“单一民族建国”,确立“多元一体”的早期理论框架。1941年,在《回回民族问题》中,中国共产党科学承认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属性,同时明确其隶属于中华民族整体,既反对国民党“中华民族只有一个、少数民族民族”的同化论,也反对日伪“泛蒙、泛回”分裂论,这正是当代“尊重多元、强化一体”的共同体逻辑。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有民族工作,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均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主线展开,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镜鉴。这一政策演进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共同体意识凝聚抗战力量的战略远见。

(二)从纲领到实践的制度化推进

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各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提升至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高度。

1939年,中国共产党系统阐述回回民族(今回族)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中主张,中央在政治上必须与汉族拥有平等的权利。同年,党中央还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该《提纲》的起草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内蒙古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民族团结的指导性文件。此外,在党中央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尊重蒙、

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2年4月,根据回族群众意愿,陕甘宁边区盆地回六庄划为一个回民自治乡,直属边回民自治区。之后又在定边成立回民自治区,为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成立多个民族自治乡,定边回民自治区和其下辖的民族自治乡全部由回族选举自己的区长、乡长,以此让回民管理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工作。在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管理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每次在选举条例制定中,对少数民族选举人数都有明确规定,以保障和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机会。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纲领和政策层面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指导,更通过逐步建立各级各类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行使自治权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更实现了政治与宗教的完全分离。

(三)民族团结与抗战的深度融合

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对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高度重视并加以妥善处理,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政治权利方面,毛泽东主席参照延安解放区推行的民主选举方法,立足新疆的具体环境与情况,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随后,新疆各地陆续组建了政务委员会,重要事务都需要经由政务委员会决议,这确保了少数民族能充分行使其民主政治权利。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经济、团结各族民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都给予少数民族扶持。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导下,蒙、回族群众开办了打盐合作社,实现了生产自救。三边分区每年定期举行骡马大会,对前来参加骡马大会的蒙、回群众实行照顾少数民族的贸易优惠政策。在尊重民族风俗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区域内多民族且宗教状况繁杂的特点,明确指出需要尊重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同时需协助他们在使用各自母语的教育领域中取得进步,避免强制其学习中文。

党中央从各个层面对民族事务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各个民族关系初步实现了和谐发展,这为抗日战争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保障胜利的有利条件。

三、现实启示

(一)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当今世界有几千多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其核心在于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正确道路。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民族工作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回顾抗战相持阶段的民族工作史,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全面推进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还极大地团结了各民族人民。最终,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成功带领各族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一切都是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面对波云诡谲的国际环境,倘若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取得安定团结的国家发展局面将十分艰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民族工作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现实需要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对立、斗争,还存在着阶级划分。民族内部不仅包含阶级剥削与压迫,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阶级剥削与压迫。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种民族内部的矛盾会逐渐扩展到民族之外,进而引发一系列民族问题。如何解决一系列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中给出了答案。只有当人类间的剥削被消除后,种族的间的剥削也会自然而然地终止,种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停止了,那么种族的对立也将随即结束。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明确指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那就是只有当无产阶级成为民族国家政权的掌控者,各民族才能真正获得平等、独立与自由。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将其为指导,深刻洞察抗战相持阶段民族问题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并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制定并实施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民族工作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理论提升。正是在结合普遍真理与特殊国情的过程中,党的民族政策逐步走向成熟,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力。

四、结语

抗战相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少数民族紧密团结,共同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各少数民族在抗战中所形成的深厚国家认同,成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积累的宝贵民族工作经验,历经岁月洗礼,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着深刻启示。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自古古以来,初无所谓教,即无所谓学。逐水草,勤畜牧,苟因温饱而已。新疆地域之内,民族多元并存,各族群众长期共处,其习俗传统与语言系统各具特色,差异显著,人民没有什么机会读书,严重影响思想文化交流。对于研究新疆史地的人而言,到了咸丰和同治时期以后,慢慢有所衰落,其原因在于新疆一隅之地,变迁太多,记载不详细,加之人名、地名、官名有蒙古语,有维吾尔语,有回语,有满洲语,很是复杂,译成汉文,又是参差不一。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授予其全面督办新疆军务之权,同时命金顺为帮办大臣,协助处理军务。左宗棠随即率军进驻肃州,刘锦棠则统领军二十营抵达吉木萨尔。经三月激战,清军全歼北疆之敌。至光绪四年(1878年),清军成功收复伊犁的作战方案。新疆重归版图之际,其面临的政治局势已然深刻嬗变,左宗棠在统筹新疆军务之时,即卓识远见,力主变革旧制,积极倡导都督制度的实施。从光绪三年起,左宗棠屡次上疏朝廷,力陈新疆改设行省乃固边安疆之要务。认为“为新疆固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对建设和开发新疆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左宗棠也非常关注晚清新疆的教育,其间陝西尚优,而甘肃为最迟,新疆则归版图既未久,且多异民族杂处,尤鲜有所谓文事。左宗棠上奏,晚清新疆地区争讼之事,曲直不能尽达。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达,颠倒混淆,时有所不免。左宗棠针对考察的新疆教育状况,积极倡导新疆地区的文化教育,提出了兴办书院、兴办义学、刊发书籍、分设学政等推动晚清新疆教育发展的目标,亦为近代化教育的形成与发展铺筑了道路。

一、开办学校,普及教育

新疆地域辽阔,人口分散,多民族交错聚居,各群体间礼俗与言语差异显著,致使教育事业举步维艰。民众多鲜就学之机,思想文化交流深受阻碍。加之阿古柏乱事摧残,待清军收复之际,新疆文教事业已凋敝不堪。语言不通致使政令难行,技术难传,社会经济深受其困。左宗棠深察其事,指此实为新疆政教疏离、官民不洽、动乱频仍之症结

左宗棠与晚清新疆教育

■ 边洁

所在。左宗棠对此十分关注,西征期间,左宗棠一再敦促各地兴办义塾,致力于教育事业之振兴。因此,收复新疆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又马上与南北两路在事诸员筹商,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广置义塾”,责成各善后机构与驻防单位大力推进义学建设,据统计,初期即建成三百七十所。

二、刊发书籍,推广汉文

随着书院的兴起,义学陆续推广,图书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交通不便的当时,西北学子研习所需的书籍,其货源主要仰赖商贩从成都、武汉等内地城市长途输送。战争牵涉乱起,以至贩书的买卖很久一段时间少有人去做。加之这些刻本错漏频出,断句谬误百出,无法满足正常的学习需求。左宗棠起先也只是买俗本发给各书院,但到底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左宗棠自己刻书。左宗棠为推广汉文,特设两处刻书机构以资刊布:汉口一处隶属于崇文书局,由西征后路粮台掌管;西安一处则依托关中书院,归西征总粮台统辖。两地刻工互通有无,西安所用匠人,部分即从汉口聘请而来。刻书银两皆出自左宗棠私俸,不涉公款。新疆平定后,迪化设局印行回民读本,该书局存续至光绪末年。

三、调整科举制度,对回民子弟予以优待

当时,西北地域的文教事业基础极为薄弱。甘肃自康熙二年虽已独立建省,但此后二百余年科举皆与陝西合闈,贡院独设西安。甘肃士子赴考,近者需行八百里,远者如宁夏、河西须跋涉二千里至三四千里,新疆迪化一带更达五六千里。往返少则月余,多则数月,盘费数十至百余两,负累深重。西北道阻且艰,民生凋敝,土人实难应举。西北地区的士子很难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愿望,即便具备报考资格,实际赴考者亦寥寥。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深受陕甘合闈制度之羁绊。该制度使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士子获取功名的门槛远高于内地,其不合理性直接削弱了本土士子勤勉向学的内在动力。基于这样的情形,左宗棠打破这二百年来的规定,在考制改革上,左宗棠力陈分闈之必要,终使甘肃获得独立乡试资格,考场设于兰州。这一请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接着兴建贡院。这就是甘肃学院和许多机关至今利用着的一片建筑物。

《复陈新疆情形折》中左宗棠记述,新疆当地的官员和百姓语言不通,也不认识对方的文字,所有事情都只能完全依靠翻译在中间传达。这样一来,经常会出现信息被错译、意思被颠倒混淆的情况。因此,左宗棠提出了广泛设立免费学堂、发展各民族教育的策略,并明确指出这才是实现新疆地区长久稳定与安宁的根本办法。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写到,新疆平定已经很久了,但新疆各民族之间仍然互不相通,彼此隔阂,官员和百姓之间也存在沟通障碍,导致政令难以推行。所有的规章制度和教化措施,都要依靠回族头目来传达,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蒙蔽和隔阂。想要改变这种弊端,就必须分别设立学堂,让回民子弟学习汉语,诵晓国家通用语言才行”。在左宗棠的主持与推动下,少数民族青少年获得学习汉语的机会,同时得以保留各民族文字,从而确立了双语并行之教育格局。这一举措切实打破了语言壁垒,有力推动了汉族与新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融合。19世纪70年代,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于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广设义学,招收内地孩子学习汉语文字,培养诵晓维、汉双语的翻译人才。为促进各族经济文化往来,数年间各地造就了一批优秀翻译人才。左宗棠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极为重视,通过设立专门面向少数民族子弟的书院与义学,系统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发挥其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他所推行的教育政策切合新疆社会实际,回应了各族群众的文化需求,因而获得广泛认同与支持,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工程,具有积极的现实启示与借鉴价值。

新疆自古便已纳入中国版图,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其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前途息息相关,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依存关系。维护祖国统一,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在近代开发新疆文化事业及爱国主义的核心。左宗棠为晚清新疆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打破语言壁垒,深化民族互嵌交融;培养了一批精通汉语汉文、具备较高专业素养的翻译人才;加强各民族在文化心理层面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归属,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根基。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当前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入落实文化润疆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时代选调生的特点与培养路径

■ 肖泽芬

架与基层实际之间存在距离,进入工作岗位后普遍会面临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

二、新时代选调生的培养路径

(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组织路线的本质要求,决定了干部工作的根本方向,有利于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干部队伍得以贯彻落实。因此,必须将党管干部原则贯穿于选调生培养的全过程,通过制定政策、规划、措施等方式,强化党组织在选调生培养工作中的领导权与管理权,以确保选调生队伍不仅要在组织程序上由党管理,更要在思想上坚定跟党走。

(二)建立健全选调生培养机制

围绕“选育管用”全链条,构建科学有效的选调生培养体系。选拔上,可根据选调生的专业背景、性格特质和岗位需求,制定“一人一策”培养方案,确保人才精准匹配岗位需求;培训上,实施岗前集中培训,基层实战化培训与岗位专业轮训,建立“导师帮带制”,帮助选调生尽快适应工作岗位与提升综合能力;实践中,通过基层驻村、急难险重任务锻炼及跨部门交流等方式,让选调

生在线上磨砺本领;管理上,建立“一人一档”成长纪实,全程跟踪成长质量,并提供职业发展激励与生活支持,促进人才管理精细化。

(三)深化理论武装

选调生学历高、视野广、思维活,但同时处于价值形塑的关键成长期。鉴于此,必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选调生培训学习的首课、主课与必修课,筑牢选调生的思想根基,锤炼选调生的忠诚党性。一方面,要加强常态化理论学习制度建设,让选调生跟进学习党的最新理论与重要会议精神。另一方面,搭建线上学习平台,利用学习强国、干部网络学院等网络资源,结合选调生的学习特点,推送精准化、定制化的理论学习内容,打造随时随地可触及的“指尖课堂”。

基金项目:受到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暨成都产园同城化”专项课题——“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优化路径研究”资助(项目编号:DY25ZX043)。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